



放慢脚步 让灵魂能够跟上

访德国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张卫奇

张卫奇于1980年到达前西德首都波恩大学攻读医学，1988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瑞典皇家卡罗琳斯卡学院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与工作。2008年，他成为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任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十几年来，他与德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多次合作，在自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报道

谈留学

初到波恩 学好德语融入当地

近日，记者来到德国历史名城明斯特，拜访明斯特大学分子精神病研究所张卫奇教授。采访前，张教授首先饶有兴致地带领记者参观老城，介绍城市的悠久历史和独特气质。

1648年，对欧洲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威斯特法伦和平条约》在明斯特古老的市政厅签署。市政厅对面的商人楼房的山墙形成了一道优雅的轮廓，在其拱廊下坐落着众多精致的商店。圣保罗大教堂近在咫尺，其面前广场上的集市闻名欧洲……

半个小时的历史文化之旅后，访谈在中世纪城墙中的一个时髦咖啡屋里展开，这也是张教授常与一些文科同事们探讨学术的地方。

谈起留学，鲁迅先生说过：“有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张卫奇当年留学的决心是，要做到有本事和全世界竞争，而不是在同胞面前夸耀。他坚持不投人所好，不找捷径，凭着好奇心，努力融入。

他介绍道，初到西德时，波恩的中国留学生用十个指头就能数出来，处处都能感受到西德社会对中国的好奇心。问题五花八门：中国有没有点灯，有没有火车、汽车，女士是否还裹脚，是不是多妻制等，把他们当作“来自晚清时代的学童”似的。

那时，年轻中国留学生的到来，

为德国人了解古老和神秘的中国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当时张卫奇和同学们才读了一年多的德语，就能不卑不亢用纯正流利的德语回答德国人的各种问题，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令很多德国人刮目相看，也令这些年轻人们倍感自豪。

而西德人的友好和诚意，以及无私的帮助，也让张卫奇感到温暖，这也是德国给他上的第一堂课：“语言是心灵的窗户。”只有学好当地语言，别人才愿意与你沟通，你才可能大显身手。

张卫奇属于经历过“文革”全过程最年轻的一代人，即所谓的“新三届”。来到德国后，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况且那个年代也没有手机，没有如微信等语音视频聊天软件，与国内交流很不方便，这也逼着他们完全融入当地社会。

他在《我们在德国当教授》一书中分享了一种与国内有趣的交流方式：“为了更生动地和家里联系，我想出了一个好点子，买了一台录音机，放进一盘空磁带，没事就在里面说上几句话。然后托在德国访问的代表团带回家，这样也能让在家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妹妹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比写信更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现在想起来，在没有电脑的80年代初，这真有一点穷人的‘土法互联网’的超前意识……”

谈教育

关注教育 文化广角镜看德国

张卫奇除了关注自己的专业，也很关心中西文化对比，中西语言对比，中西医学对比和中西人文对比等。他说，不仅仅要将自己培养成一台视野深入的“专业显微镜”，更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一台视野宽广的“文化广角镜”。

中国的高校深受英美体系影响，而张卫奇来到西德才真正体会到，德国教育系统和英美教学系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首先发现德国传统大学都没有校门、没有围墙，更没有英国牛津、剑桥或者美国哈佛式的校园，学校的各个院系甚至实验室和课堂都分布在城市的各处，真可谓“城市有多大，学校就有多大”。

这看似只是一个办校和院系组织的形式问题，但恰好最能体现德国人办大学的灵魂，即“洪堡的教育理想”，其核心是：高等学院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结合各学科特点的综合

体美化教育。也就是说，大学的任务不是为了培养高级技术人员（那是大专、中专和技校的任务），而是为了培养充满情操修养的、有自觉和责任心的“独立自主的世界公民”。这点和中国固有的“学而优则仕”的目的有很大不同。

张卫奇教授说，大学阶段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轻自由时光，要努力追求，努力尝试。如果功利心太强，在开始阶段就以结果为导向，最终就会同质化。德国的教育则是赋予你一种能力，基于这种能力自己去追寻感兴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最终教会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他还引用了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的一段话：真正的教育，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获得幸福的能力。



上图为张卫奇教授。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摄

谈医学

心怀感恩 助人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

在张卫奇教授看来，很多人将医学简单地理解为治疗疾病的技术，这并不全面，因为病人不仅仅需要医学家，更需要医生；而医生对病人需要“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回想当年的开学典礼，医学院院长的一段话令张卫奇记忆犹新：大多数数学科只要经过学校考试就能毕业，

只有医学、教育和法律这三门学科例外，必须经过国家考试（Staatsexamen）才能毕业。这是因为这三门学科的毕业生，有权利去实施代表国家主权的职能。一个国家没有火车、拖拉机，缺乏财富，也许会暂时落后，但不会影响国家的生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兢兢业业、遵守职责的医生，那就是“人命关天”；如果没有兢兢业业、

遵守职责的律师和法官，那就会“国运难安”；如果没有兢兢业业、遵守职责的教师，那就只能是“末日危途”。

对于学医的经历，张卫奇教授心怀感恩之心：“它不仅让我有机会、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更让我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医生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对生灵的恭顺，对命运的忍耐，对他人的谦逊。”

谈科研

搭建桥梁 为中国精神疾病研究出一份力

对待科研，张卫奇教授不喜欢去追热门课题，而是热衷于脑科学中更有挑战性、冒险性更大的课题。在他所研究的精神病发病机制领域中，他的尝试非常大胆。

一个人遭受精神创伤后，基因是不会改变的。但是通过小白鼠的试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排除外界环境因素后，后天的经历仍有可能遗传给下一代。但是这种“非基因”的遗传到底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呢？这就是张卫奇教授觉得很有挑战性、值得追逐的研究课题。

另外，张卫奇教授是德国华人教授协会的理事，他介绍道，德国华人教授们常常思考，如何为中国的年轻学生和中德科技交流多做点事情。在

他们联合推出《我们在德国当教授》一书后，教授协会又拟了一套系列书籍的新题目，暂定为“德国华人教授看德国”，希望通过这套系列书更加全面地介绍德国，更加深入地带领读者走进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

张卫奇教授本人筹划为此写一本书，介绍德国精神病医疗机构的演变史。德国人也曾经也对精神病很忌讳，而且德国社会对精神病的宽容度增高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就如现在中国还将精神病学称作心理医学科，将精神病治疗中心成为精神卫生中心。

他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将德国对于精神病研究、认识、治疗及宽容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来，帮助国人放弃

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和抵触以及对精神病人的宽容。

他还强调，精神疾病的治疗基于一种分析法的思路，主要是以语言交流为基础，构筑于对生命、社会和人文背景等的理解之上。当今主流精神病学学科的主要理论和教义都由欧美人发展和编写，深受欧美语言、社会风俗习惯、宗教背景等等的的影响，所以中国人在采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时需要结合我们的语言特点、人文特色等进行适当地改良。

基于他本人对中西的语言和文化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希望能够发挥这个优势，起到一种桥梁作用，为中国的精神疾病的治疗系统的健全出一点力。

谈心理

日久年长 放慢争分夺秒的脚步会更幸福

除了在学校的教研外，张卫奇教授还经常受邀举办各种心理健康讲座，在这些场合，他会结合自己的专业，深入浅出地为听众“排忧解难”。

谈到人的需求，最经典的理论就是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模型。过去，特别是灾难或者战争时期，人的需求基本上在安全与生理需求这两个层次徘徊。在这个阶层，每个人都会为衣温食饱和传宗接代的保障而感到幸福。现代社会人们以及不能为温饱和传宗接代的保障而感到满足，他们更关心的是塔尖的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可惜金字塔的顶端永远是体量最小的。若是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标准去定义幸福（比如考上名牌大学或富裕程

度等），难免会有人因此失落、失意，甚至发生悲剧。

现代人相比过去有了更多的选择性、更加独立性。但是当选择过多时，人们往往因为纠结，变得不再幸福。人与人之间过分产生比较，可悲的相对幸福感也就出现了。另外，现代社会个体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过分的独立而不懂得分享，也是不幸福的原因。每个人都会有盲点，有时难免忽视现实，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张卫奇教授说：传统的中国人很重视现实，偏爱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中国近代史上的衰落给国人心理上带来了许多恍惚，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怀疑。美国是一个争分夺秒的国

度，他们在近代史上的飞黄腾达，使我们对它产生了由衷的羡慕，也使我们对这种美国式的“争分夺秒”产生了一种偏爱，非学而用之而后快。有人说：“热心争分夺秒，就会放弃日久年长”，美国式的“争分夺秒”也许就有这种内在的弊病。而欧洲的文化传统却不乏保持“日久年长”的应变思路，他希望中国学习西方应该多一些欧洲，少一些美国。有一句箴言说：“走得太快就需要停一下，让灵魂跟上”，也许在全球化、数字化的今天，我们需要不时地放慢那“争分夺秒”的脚步，让我们的灵魂有机会跟上，这也许是我们得到心理平衡的重要环节。